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音韻學

方法和實踐

郑 伟 著

廣韻下平聲卷第二

蘇 前 先第一 仙同用

蕭 蕭第三 宵同用

胡 肴第五 獨用

歌 歌第七 戈同用

莫 麻第九 獨用

徒 唐第十一

古 耕第十三

倉 青第十五 獨用

都 登第十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学：方法和实践 / 郑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7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ISBN 978-7-5325-8782-7

I. ①音… II. ①郑… III. ①汉语—音韵学②汉语方言—音韵学—方言研究 IV. ①H11②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6959 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音韵学：方法和实践

郑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m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4.25 插页 3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8782-7

H·197 定价：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的研究获以下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壮泰语古籍与古文字中的汉字音
及其历史层次”（17YJA740073）

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基金（#141101）

2010年度纪念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研究学会“李方桂田野调查奖”
（LFK Fieldwork Award）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青年学者”岗位科研基金

本书的出版获以下项目资助：

2016年度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

三百年来的音韵学所以能成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都能有这种科学的精神。

—— 胡适(1891—1962)

若把一个熟习语音学的人和这样一个无工具的研究者比长短,是没法子竞争的。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

—— 傅斯年(1896—1950)

前言：音韵研究的传统与创新

传统的中国音韵学,大致包括古音学(先秦韵文、谐声字)、今音学(《切韵》系韵书)、等韵学(《韵镜》、《切韵指掌图》等唐宋韵图)、北音学(元代以后的北方韵书)四个门类。这是按照其处理的基本资料来分的,当然也兼顾了研究资料的时代早晚。如果单从时代来划分,音韵学可以分作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三个大的分支。为什么没有包括现代音呢?那是因为这里所用的“音韵学”名称,是个狭义的定义,具体地说,研究汉语史文献资料所见的语音现象,才被纳入音韵学的范围。我们知道,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是汉语史各个阶段的音韵系统(phonological system),而核心问题是音节(syllable),包括音节结构的类型,声母(initial)、介音(medial)、韵腹元音(main vowel)、韵尾(ending)、声调(tone)等音节成分的性质、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等。很明显,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因此,音韵(音韵系统/音系)演变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汉语史不同阶段的音系,也应该包括汉语方言的音系。

按照作者的理解,说到某一门学科的研究传统与创新,不外乎三个层面,一是观念(ideal),二是材料(source),三是方法(method)。就汉语音韵的研究而言,观念层面的传统是经世致用,材料层面的传统是历代古书,方法层面的传统是文献考证。简言之,就是从文献(“读经”)到文献(“解经”)。《白虎通》、《释名》、《说文》等古书中的譬况、合音、声训、读若等材料是为代表。东汉以后,西学(不是所谓“西方”之学,而是“西域”之学)的传入打破了这一传统。反切注音的兴起(周法高《佛教东传对中国音韵学之影响》,载氏著《中国语文论丛》,台北正中书

局 1963 年)、永明“声病说”和近体律诗的产生(梅祖麟、梅维恒《梵文诗律和诗病说对齐梁声律形成的影响》,《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91 年第 51 期)、四声的发现(陈寅恪《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 9 卷第 2 期,1934 年),都受到了梵文的影响。中唐以降,《韵镜》等韵图用声韵纵横相配的方法记录汉字音节、用“字母”来统括汉字声母,同样也与梵文的影响不无关系(罗常培《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4 期,1935 年;李新魁《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兼论饶宗颐先生对梵学研究的贡献》,《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反切、韵图都是声韵相配的音节结构分析方法,本质上说都是结构主义。

肇自南宋、盛行于有清三百年的古音学研究,基本上已摆脱经学的樊篱,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明代陈第(1541—1617)提出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毛诗古音考·序》),标志着汉语音韵研究进入了全新时期。语音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后人读《诗经》,不能因为读起来不押韵而认为“古人韵缓”。以此种认识为前提,音理的探讨才有可能;可以说,这也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演化论”在语言学领域的先声。Juliette Blevins《演化音系学: 语音类型的涌现》(*Evolutionary Phonology: The Emergence of Sound Patter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书的第二章开头就引了陈第这段话。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如果说陈第对古音的研究还停留在“仅仅单独辨每字古读某,而不曾比类综合,探本寻源,归纳出古韵的部类分合,仍然是散漫而无系统的知识”(周祖谟《音学五书·前言》,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1 页)的阶段,那么顾氏不但在古音学领域著述丰硕,开创性地撰成《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古音表》二卷等,而且其“分部归字虽然借《广韵》韵部名称以为统摄,但并不为《广韵》韵部所囿,而能离析《广韵》,把不同韵的字分隶于古韵两部。如支韵字一半入脂之,一半入歌戈;尤韵字一半入脂之,一半入萧宵;麻韵字一半入鱼虞,一半入歌戈;庚韵字一半入阳唐,一半入耕清。足见用心之细。后来江永、段玉裁步其踵武,擘析更精,成就更大。由此可知: 顾氏启牖之功诚不可没”(见前引文,第 2—3 页)。顾氏用“离析唐韵”(学界惯用此名,《唐韵》即指《广韵》)的方法,指出中古同个

韵类所辖各字，上古可能属于不同韵部，上古同个韵部所辖各字，中古可能属于不同韵类，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相合。

胡适先生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二卷，亚东图书馆 1930 年，第 188 页）一文中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

在肯定了清代学者科学的治学方法之后，胡氏随即指出了他们在材料上的局限，“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证，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自然科学的材料却可以产生实验的方法；实验便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随意创造平常不可得见的情境，逼拶出新结果来。”（见前引文，第 196—197 页）

胡适在当时鼓吹民主与科学，对清代学术的评价既有中肯之处，同时也不无偏颇。正如上文所述，包括古音研究在内的清代朴学，其成就绝不仅仅限于《皇清经解》而已。文献考证、结构分析都是清代朴学在音韵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传统与创新。只不过，材料决定方法，清儒所见材料有限，所以在方法上已无法再有创新。

就研究材料而言，19 世纪末以来有“五大发现”：（1）殷墟甲骨文字；（2）敦煌、塞上及西域简牍；（3）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写卷；（4）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5）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4 年,第 4—5 页)。很巧的是,这五项新材料,对音韵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甲骨文中所见谐声字、西汉简牍所见通假字可用来考证周秦两汉的声韵,敦煌所见诸多唐人韵书残卷可用来作为考订六朝隋唐声韵的重要证据。清廷内府藏宋濂跋和项子京跋等《切韵》(601)版本,更是丰富了学界对中古韵书的认识,尤其是宋跋本,是迄今唯一完整的、时代上最接近陆法言《切韵》的版本。西夏国书、契丹小字、八思巴字等外族古文字古文献,则为宋元辽金时期北方汉语语音的研究提供了标音性的证据。

总的来说,以上所列,仍然属于历史文献材料考证的范畴。下面谨就晚清民国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音韵学研究之传统与创新,以研究方法为纲,逐一检点并加以评述。

一、历史比较

历史比较语言学于 19 世纪中后期在欧洲兴起,标志着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在基本观念上,强调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如有例外,也是另外的规律在起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使用比较的方法,为具有发生学联系的一组语言构拟早期的形式,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梅耶(Meillet Antoine)说“比较研究是语言学家用来建立语言史唯一有效的工具。我们要观察的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化本身。所以只有把这些结果结合起来才能追溯语言的发展”(《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载《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 1992 年,第 11 页)。在研究材料上,强调了现实语言而不是古代文献的重要性,“即使是最好的文字(书面语言)也不能准确地记录口语的连续变化。文字(书面语言)时常是固定了的,世代相传,它的形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在文字(书面语言)还没有完全固定的时候,书写习惯大体上总要受以前形式的支配——这些形式又不是大家都熟悉的。……语言的历史是要把语言的状况加以比较才能建立起来的。因为人们在写作的时候,虽然偶然也会或多或少依照当时的口语习惯,但是历代文献所提供的事实,比起那些从来没有人把它记载下来的重大事实,差不多总是不大重要、无关轻重的”(见前引文,第 9—11 页)。

历史比较法在 19 世纪的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格林定律”(Grimm's law)、“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s law)、“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等是其代表。瑞典学者高本汉(Berhnard Karlgren)将历史比较法用于汉语中古音韵的研究,著成《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原书为法文版,由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的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合译成中文,于 1940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甫一问世,便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亦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标志性著作。傅斯年在中文版的序中评价该书时说:“在其前三卷出版后,顿引起列国治汉学者之绝大兴趣,我国人士治语文之学能读法文者,亦无不引为学术上之幸事。盖其综合西方学人方音研究之方法与我国历来相传反切等韵之学,实具承前启后之大力量,而开汉学进展之一大关键也。”高氏在书中援引了三十多处汉语方言,用比较方法构拟中古的声、韵、调系统。因为得了新的材料(现代方言)与方法(历史比较),其学术影响无疑超越了有清三百年。

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于 1927 年 10 月开始进行吴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并于次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一书。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2000 年,第 482—483 页)对该书的评价是:“从书的架构来看,目的是得到吴语方言第一手资料,而且是准备用比较方法来构拟共同吴语的。”我们可以注意到,赵元任在《吴语》一书中,列出了 33 个调查点,而高本汉的《研究》第四部分“方言字汇”部分,恰好也是 33 个点(其中三种是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这种巧合恐怕是有意为之。非汉语方面,王静如《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史语所集刊》第 3 本第 1 分,1931 年)比较了汉语、侗台、藏缅诸语言的数词与代词,探讨其共同来源。李方桂《广西凌云瑶语》(《史语所集刊》第 1 本第 4 分,1930 年)根据当时能见到的语料,利用比较方法,提出瑶语与苗语(而不是与泰语)有亲缘关系;“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史语所集刊》1943 年第 11 本)一文通过对现代侗台语各方言的比较,为古台语构拟了一套带前喉塞音的声母。闻宥《印度支那语族概说》(《边政公论》第 1 卷第 5—6 期,1941 年)提出了“印度支那语族”假设,将汉语及西南少数民

族语言分作西藏缅甸、汉泰两大语系；《印度支那语中双唇鼻声之舌面化》（《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广征藏、羌、彝、纳西、木雅、瑶、白泰等民族语材料，联系汉语谐声字，探讨了双唇鼻音[m]的舌面化音变。张琨《苗瑶语声调问题》（《史语所集刊》1947年第16本）一文通过对苗瑶语方言的历史比较，提出古苗瑶语具有八个声调，阴、阳调类各占一半。王静如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张琨早年亦毕业于清华，后在史语所任职，并追随李方桂从事藏缅、苗瑶语言的调查。闻宥虽无史语所背景，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致力于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在纳西文、方块壮文、字喃、彝文、羌语等领域均有开创之功。

二、译音对勘

自20世纪初始，欧美汉学家贝利(H. W. Bailey)、劳费尔(B. Laufer)、沙畹(E.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卜弼德(P. A. Boodberg)等，都曾撰文讨论过中国古书里诸如“突厥”、“吐谷浑”、“拓跋”(桃花石)、“撑犁”(天)、“丝”等专名的汉文写法，或者是它们在外语中的对音问题。尤其是伯希和，凭借其对古代西域(即中亚地区)各种外族遗文的熟稔和深厚广博的语文学知识，在该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成果，还包括像《论古汉语音韵学》(*Sur la phonétique du chinois ancien*)这样的未发表著作[韩百诗(Hambis, Louis)《法国的蒙古学泰斗——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昇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7页]。正如评论者所说，“如果人们想由此而说伯希和从未描述过一种语言状态，那么他就不是—名真正的语言学家。伯希和非常注重对音问题，他觉得，唯有一种严格的对音体系，尤其是那些专用名词或外来词的汉文对音，才可以使人确定在借鉴方面的词汇衔接之真相，而历史的衔接却要依靠语言的衔接。他在此问题也成为一代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首倡者和先驱”(路易·勒努(Renou, Louis)《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见前引书，第350页)。

作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粟特语、突厥语、吐火罗语、佉卢文、回鹘文、梵文、藏文、阿拉伯文等中亚古代语文的考证上，并没有太多顾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即便如此，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

两位在汉学方面的杰出工作，对当时正在全力撰写博士论文的高本汉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以至于他要加快工作的进度，当得知伯希和放弃开设古汉语语音学课程以及伯希和因战争不能担任他的论文答辩主考官后，高本汉为之雀跃不已（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李之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99—100、132、307页）。

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他》（《星岛日报》1949年4月3日）曾言及佉卢文 Cinstan 为“震旦”之读音，又谓羯人语“万”字读若 Tman，当借自汉语。虽涉及对音，惜材料零散，结论亦不全面。真正有意识地运用外语译音来做中国古音研究的，当属俄国汉学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钢氏指出：“研究各时代的汉字如何读法，有三个重要的材料来源。第一，中国各种方言里与日本安南朝鲜文里汉字读音的比较研究。第二，古字典（《唐韵》之类）里用反切表示汉字的读法，古韵表可以考见韵母的分类。第三，中国字在外国文里的译音，与外国字在中国文里的译音。”这里所说的第一、第三两点，都关乎中外译音。钢氏利用他收集的法天、梵赞诸僧的梵文密咒（Mantras）的汉字译音，印证了高本汉关于《切韵》的构拟，这一观察角度是前人研究中古音时未曾措意的。胡适将其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界，并引起了一番热烈的讨论。随后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广采梵汉对音，兼及《史记》、《汉书》至唐宋史籍所见外国专名之译音、日本汉音等，提出“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钱玄同在该文附以跋语，肯定了汪氏对歌戈鱼虞模古读的考证之功，并引《吕氏春秋·重言》里管仲言伐莒时“口呿而不唞”证明鱼部字上古当读开口。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2分，1930年）以西夏文、藏文的汉字译音材料为据，结合现代方言，考察宋代西北方音的声韵特点，所揭之语言事实如[m]变[b]、[n]变[d]、[ŋ]变[g]、[aŋ]近似[o]、[eŋ]近似[e]等。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专刊》1933年）征引《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金刚经》、《唐蕃会盟碑》等汉藏对音材料及注音本《开蒙要训》，成为利用译音对勘方法研究古音的经典之作。

三、词族比较

古汉语中有大量音近异同的词，诸如“解懈”“见现”之类，是为同源词（或称“同族词”）。北宋贾昌朝（997—1065）《群经音辨》有感于“近世字书磨灭，惟陆德明《经典释文》备载诸家音训。先儒之学，传授异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分作五类讨论：一、字同音异，如中和之“中”（陟弓切，平声）与适中之“中”（陟用切，去声）；二、字音清浊，如训“屈也”之“折”（之舌切，清声）与训“既屈也”之“折”（市列切，浊声）；三、彼此异音，如取于人曰贷之“贷”（他得切，入声）与“与之曰贷”之“贷”（他代切，舒声）；四、字音疑混，如“居高定体”之“上”（时亮切，去声）与“自下而升”之“上”（时掌切，上声）；五、字训得失，如《说文》训“水凝也，俗作凝”的“冰”（鱼陵切）、“凝”（彼陵切）二字。虽然此书并非探讨音义关联的专著，归类也不尽合理，但所举语例基本均属同源词，因此椎轮之功不可没。

在汉语词源学、词族比较方面有开创性研究的学者，有两位不得不提。一位是杨树达，杨先生 1905—1911 年间留学日本，既有深厚的旧学根柢，又深受新学影响。杨氏自谓：“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 Etymology 的影响的。”（《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他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研究，充分发挥“因声求义”，由声音的联系推求不同字在词义上的关系，进而建立词族。汉语里声韵上有联系的字，除了同声符的谐声字（“工江”之类），还有假借字（“其箕”之类）、转注字（“考老”之类），而另外一大宗就是同族词了。杨氏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汇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 1954 年）之中。二书内容浩博，不能具引，我们仅从其《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的记录中择引数条，以见一斑：

五月廿二日。看《汉书·鲍宣传》。“浆酒霍肉”，颜〔师古〕释“霍”为藿叶，于文例不合。余定为臠之假字。《说文》：“臠，肉羹也。”（一九二八年记）

三月十八日。撰《〈庄子〉“意怠”“鹪鹩”一鸟说》。|三十一日。《方

言》、《广雅》“桓”训忧，王、钱疏皆不得其说。余疑桓与患古音近，古书容当有假桓为患者，故子云有此训，特今日不可得见耳。|七月二十五日。读《说文》，悟慈字当受义于子，兹、子古音同也。慈当训爱子，许[慎]但训爱，广泛不切矣。段注亦无所发明。|十月五日。读《说文》，治声训。磬训侧出泉，盖假声为顷，顷为头顷侧也。馨训香之远，殷盖假为迥，迥训远也。（一九三二年记）

另一位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于1926年完成了汉语中古音领域的名山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后，开始向上古音研究进军，陆续发表的有关论著有：“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原始汉语为屈折语说，1920）、“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中日汉字分析字典，1923）、“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s of the Chinese Scripts”（汉字的谐声原则，1925）、“Tibetan and Chinese”（藏语和汉语，1931）、“Shi King Researches”（诗经研究，1932）、“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1928）、“The Poetic Parts in Lao-Tsi”（老子韵语，1932）、“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汉语词类，1933）等。其中最后一种，原本是在《远东博物馆集刊》（BMFEA）第五卷发表的长篇论文，后由张世禄先生译成中文，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高书一上来便开宗明义，阐明其研究汉语词族目的：

研究中国语音历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准备做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所谓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就是把中国语、台语、西藏缅甸语作一种系统的比较，这些语言虽然是歧异的方言，而为亲属的语言确实无疑。可是，依我的见解，这种的研究并不宜于掇拾孤独的中国“语词”而把它们来和孤独的西藏或暹罗语词相比较。其理由是在中国语上并非包含着某某数千独立的单音缀，它们彼此间毫无亲属关系的；中国语里也正和其他一切语言里一样，语词组成许多族类，各类的亲属语词由同一本原的语根所构成的。例如中国语的“目”mĭôk（眼睛），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这

个 mǐōk 所属的族类建立起来,就不能证明它和西藏语 mig(眼睛)系属同一的。“眸”这个语词,上古音 mǐōg(瞳睛),它和 mǐōk 属于同类,确是无疑;也正是相像这个 mǐōg 乃直接相合于西藏语的 mig 的。

我们把高氏的意思略作概括:(1) 上古音的研究是汉藏比较语言学的前期准备工作;(2) 不能直接将适用于分析型的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法直接照搬来研究孤立型的汉藏系语言,而应该注重词族,即对音义相通的同源词的搜集、整理。(3) 以汉语“目”“眸”为例,二字的差异在于韵尾的清浊,且词义相近,是为同源词,属同个词族;它们与藏语 mig 亦同源。

相较而言,杨、高二人的研究方法都很科学,但实有不同。杨树达先生在 1952 年 8 月 12 日的日记中,谈及其《述林》一书交当时中国科学院审查后的反馈意见,申明了自己研究语源学的方法,归结起来有五点:第一,受欧洲近现代研究方法之影响;第二,既重《说文》,亦重段玉裁、桂馥等清代学者的注解;第三,强调广征语料,不排斥现代语言;第四,尤其重视甲金文字;第五,强调形义密合,从浩瀚古书中发现字词的音义联系,音韵考证倒在其次。概括言之,杨氏注重形义和内证。

高本汉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训练,虽然研究范围广涉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与宗教等,但其主业无疑是音韵学。所以高氏的立场是“要研究中国的语源学,势必至于进入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范围。而要把中国的语词来和西藏语、暹罗语上的相比较,第一步的工作还须在考定中国上古音。依着中国上古的音读分列中国语词的族类,这就是奠定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基础”(见张世禄《词类》序言)。概括言之:第一,高氏的研究目的,是服务于将来的汉藏比较语言学,而非杨氏只重视词源研究本身;第二,注重音韵考证,而非杨氏的形义联系;第三,高氏援引藏语、台语等印证汉语内部的同源词,而杨氏只用内证;第四,高氏讲求音韵转换规则,比如韵尾辅音交替、声母辅音交替、介音交替、元音交替等,杨氏则不强调同族词之间的音韵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从杨树达的日记节本来看,他与高本汉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时相过从，互通文字：（皆见前引《积微翁回忆录》）

四月六日。访胡适之，见告瑞典高本汉近著《诗经研究》，论及《老子》，称余《老子古义》之美，容当假与余读之。|四月二十九日。访胡适之，见示瑞典高本汉《老子之韵语》论文，中引及《老子古义》，……胡适之旋以此册赠余。|十一月八日。高本汉寄赠论文二篇：一为《诗经古韵》，即前某君见示者；一为纪念蔡元培作者。（一九三三年记）

十一月二十三日。瑞典高本汉寄所著《中国语语族》论文来。|十二月三日。高本汉屡赠其著作，以《古声韵讨论集》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释旒》以下十一篇寄赠答之。（一九三四年记）

一月十二日。美国人卜德寄所著《左传与国语》论文来，中证高本汉《左传》非伪书之说，颇有心思。（一九三五年记）

二月十九日。瑞典高本汉寄所著论文四册来。中有《古铜器所见之殷周》一首，景印鼎彝甚多。（一九三六年记）

杨、高二人除了互赠著作，也比较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作为中西方词源学研究的大家，也可堪称一段佳话。

四、语音实验

在学术取向上，西方现代语音学和中国传统音韵学截然不同，前者偏重实证，依赖于自然科学技术，主要包括生理、物理、心理三个分支；后者偏重主观认知，有人为因素介入，虽然也不乏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但总的来说是经验性学科。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三）曾记载“颞叫子”的故事：“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颞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颞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可能是史籍所见中国关于言语病理及矫治的最早案例了。

国内学界对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往往叹服其在音韵史文献考

证和现代方言历史比较方面的惊人成就，而该书其实还有一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高氏指出了一些可以用于语音分析的实验仪器。比如可以用假腭、X光、探口器来观察元音的发音部位，用音叉、Lioret 仪器来测定元音的音高。高氏说：“我现在所想作的是一个打粗样的工作，就是在没有人到过的树林子去作第一次开荒的麻烦工作，这在印欧语言里是已经早有人作过的了。这种工作得要尽量研究很多中国方言的最重要的音韵特质。虽然要把所有实验语言学的方法都应用到那么大的一个范围里去探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得到的事，但是这种工作至少也必须有个一致的方法，并且，在可能范围之内，还得有一个深切而又不太琐碎的语言学所需要的准确度。”在这段话中，高氏指出了几件重要的事实。第一，印欧语的语音实验已成气候，但汉语及其方言的现代语音学研究则有待开展；第二，实验语言学的最佳状态，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团队协作或者说借助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学科）才是成效最好的状态；第三，汉语方言的实验研究必须有赖于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刘复（半农）先生是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1925 年他在法国巴黎获得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两年，刘氏发表《实验四声变化之一例》（《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前一年，他的博士论文以《四声实验录》为名在上海群益书社出版。是书发明了“乙二声调推断尺”，还首次用浪纹计阐明了基频是声调的物理基础，并对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今腾冲）等十二处汉语方言的声调作了实验分析，亦对四声问题作了历史性的追溯。《实验录》指出了实验语音学的基本方法，直到今天也句句在理，“实验语音学是附属于言语学范围内的；他研究时所取的材料是语言，他所以要研究的目的是为着语言。但他研究的方法，却已脱离了言语学而与声学、乐音学、算学相关；所以有许多地方，物理、乐理、数理互相结合”（参见该书引言）。1929 年，刘复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是中国最早的专门致力于现代语音学研究的学术机构。1934 年刘复逝世后，改由罗常培先生继续主持该实验室。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致力于语音实验研究的另一位大师是赵元任。1922